

财富创造与供给侧改革*

黄志刚

【提要】从财富创造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互联网是财富之母,创新是财富之父”是新时代财富创造最集中的本质表现,供给侧改革应该围绕新财富时代的本质作一个长远的制度安排。面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现实挑战,必须突出新财富时代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重点,即市场、互联网和创新,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方案。

【关键词】财富创造 互联网 创新 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2-0060-09

一、引言

具有价值的东西即可称之为财富。财富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分,马克思在解释“财富”一词时更强调其社会属性,即“财富不过表现为人的活动。”^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②而商品显然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结果。斯密也认为国民财富“由社会劳动每年所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构成”。^③在统计意义上,一国财富通常可解释为其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即一国财富的增长。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都是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普遍步入柔和增长阶段的形势下,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新源泉成为各国政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寻找经济增长的源泉,或者说,探讨财富如何产生,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因为它规定了未来世界经济取向并长期影响各国经济战

略和制度安排。

供给侧改革是应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举措,但目前从财富创造角度研究供给侧改革的研究几乎没有。经济发展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与财富创造是密切相关的,把握了财富创造源泉,就把握了经济增长的关键点,也就真正把握了供给侧改革的要点。

二、财富创造理论的发展

(一)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创造理论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有关财富的来源的经济理论解说也随之而变。配第认为,

*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微观视角的货币政策组合非对称传导效应研究”(71473039)的资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7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页。

③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44页。

“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① 从而说明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财富。在此基础上，斯密和李嘉图确立了劳动价值论，并强调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性，如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开篇就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② 但是，配第、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没有区分价值创造的源泉和使用价值创造的源泉，没有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矛盾的、不完备的，由此决定其对财富来源的观点也是前后不一的。马克思在肯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并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强调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值。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这些价值和使用价值就具体体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③ 即社会财富。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财富创造理论

随着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工业革命对财富来源的历史性变革，土地作为财富之母的地位有所衰落，资本与技术则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则不断提升。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以生产函数的形式来说明社会产品或财富的来源。作为经济增长理论出现的标志，哈罗德模型中生产过程只有劳动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不存在技术进步；索洛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其中财富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共同创造的。这里的“技术”是指“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④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知识积累很可能是世界范围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被称为增长核算或增长原因分析之“父”，根据丹尼森的结论，知识进展是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其所言的知识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等。^⑤

资源是财富创造的基础，知识（或技术）是财富创造的核心，这可以说已经是经济学界的共识。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当代经济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土地的束缚，经济发展的“沃土”已经逐渐从实体的土地转向无形的互联网；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知识（或技术）中的创新要素对财富创造的贡献显得更加重要。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除了强调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之外，也一直强调制度安排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斯密的《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就是“论劳动分工对财富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强调“日益精细的劳动分工加速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使国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⑥ 分工和交换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市场是这一制度的具体体现，不断深化和细化市场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互联网时代的财富创造

（一）互联网是财富之母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或者说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各种新经济增长模型，强调“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是解释“索洛余值”或现代财富来源的最重要变量。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财富形成的社会生产方式出现了颠覆性创新，互联网为各种经济活动和财富创造提供了绝佳的平台。现实中的人们，不是仅生活在“土地之上”，而是“生活在土地与网络之间”。基于“+互联网”和“互联网+”的电商平台、互联网金融、智能制造等各种新型资源（网络和数据）、新型业态、新型劳动和新型服

① [英] 威廉·配第：《赋税论》，陈东野译，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66 页。

②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1 页。

③ 《资本论》第 1 卷，第 47 页。

④ [美] 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三版）》，王根蓓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 页。

⑤ 参见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下册 宏观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32 页。

⑥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胡长明译，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 页。

务,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新的资源和业态及与其共同创造财富的方式(新型劳动与服务)对土地和一般性体力劳动的依赖很小。纵观近些年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果,大多与互联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交流持续推动科技和社会进步、基于互联网的分布式计算和云计算等正成为科学发现和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基于互联网的各种生活服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4.48亿,在网上预订过机票、酒店、火车票或旅游度假产品的网民规模达到2.64亿,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规模达到4.55亿,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的网民规模达到1.01亿,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1.18亿,网络预约出租车用户规模为1.59亿,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到1.76亿。^①互联网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种财富的创造与互联网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互联网是财富之母”已成为当今现实的真实写照。

长尾理论认为,产业发展满足一条类似于正态分布的曲线,所有资源的大规模供给都会在利益的驱使下集中于主流业务上,即正态分布的波峰处,越往尾部需求越少,属于小众个性化定制业务的范畴。随着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和人们个性的觉醒,未来这条长尾曲线必然会朝扁平化方向发展,而伴随着主流需求的下降和尾部力量的上升,传统模式下的企业将举步维艰。同时,由于我国落后产能的积压,加速了产品价格的不断走低,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从而抑制了行业中优质企业的利润和创新空间,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的竞争力不足。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我国的供需关系严重不协调,亟须挖掘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来解决这个问题。互联网的普遍应用,让我们接触到了以前未曾想过的领域,创造出一片财富的新“蓝海”。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通过交易技术创新和交易结构创新,正从被动地满足主流用户的需求发展为主动地引导并创造出新的需求,使原

先传统企业不敢接触也不愿接触的处于尾部的那些用户成为了新技术下的需求新亮点,通过互联网技术发掘尾部客户潜在需求并覆盖该部分市场。正如长尾理论所描述的,尾部市场的用户数虽少,但集聚起来的总规模其实与主流市场规模不相上下,不得不说是互联网这个“催化剂”将原本潜在的需求转化成为现实经济生活中可以利用的显性需求,不仅颠覆性地创造出了新的业务增长点,还在用户体验和精准服务上有了质的飞跃。

互联网的核心是信息的高速传导,其虽不能直接传递实物资产,但是在资产的流通化、金融化等所涉及到的环节,都可以发挥作用。^②以金融创新为例,在资产证券化领域,互联网金融可以加速资产池的构建和证券流通;在供应链金融领域,互联网化的交易结构能够提高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沟通效率,提高借贷交易和资金结算效率;在实务资产交易领域,互联网金融能够发挥信息撮合优势,集中呈现交易需求,提高交易成功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资产的快速变现。因此,只有不断在交易结构和交易技术上创新,才能真正地激活互联网,为金融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在互联网源源不断创造财富的同时,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收集、分类存储和高效分析成为最为重要的问题。例如金融服务机构,由于主流客户群体的同一性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服务的成本,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传统金融服务的重心,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长尾理论所说的尾部客户的需求越来越受到各服务业的关注,而要基于零散的个人数据资料提供优质的定制化服务,需要耗费高额的收集、存储和分析费用;同时,中国网民数已发展为全球最大的规模,每天数以亿计的信息资料在互联网平台上产生,从财富的角度来说,所有这些资料都是财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7月)》,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hlwtjbg/201608/t20160803_54392.htm, 2016年12月5日。

^② 谢平、邹传伟、刘海二:《互联网金融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富的“原材料”，而将这些多样性、海量、快速产生、有价值的数据有效收集、分类、存储和分析，需要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支撑。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实时动态和低成本地在互联网上产生的一切有价值的数据转变为财富，同时推动各项服务的升级、用户体验的改善、业态模式的优化和资源共享的开放，催生出一系列以“数据驱动模式”为特征的新型互联网企业，为我国建立起高效的互联网信用评价体系提供必要的支持。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新环境背景下，互联网作为财富之母的说法毫不夸张。

（二）创新是财富之父

在现今互联网作为新媒介、新工具的生产方式下，虽然劳动作为财富之父的地位并未发生动摇，但是，新技术的使用与发展逐渐成为驱动劳动的社会形式发生巨大历史性变化的因素，即创新成为必不可少的新兴生产要素。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带领人类进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揭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帷幕，第三次工业革命由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所支撑。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人类一般性劳动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始终居于首要的地位，绝大部分的财富创造都需要人类劳动的直接参与。而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工业智能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使大部分的人类一般性劳动（几乎全部的简单劳动和一部分复杂劳动）都可能被机器所取代，这类劳动并不能从根本上创造财富；只有人工智能和工业智能化无法完成的人类劳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创造者，这类劳动具有明显的“创新”属性。因此，在互联网知识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并不是所有劳动都是“财富之父”，而只有创新（创新性的劳动）才是“财富之父”。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邓小平更是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科学技术本身包含了“创新”的意义，没有创新的科学技术难以称之

为科学技术。刘诗白指出，“科技创新是现代财富创造的决定性因素”，并提出了一个公式：“社会科技大脑+社会实验手段=科技发明和创新”。^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财富的创造是扩大再生产创造新价值的过程，而扩大再生产又可分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与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两类。前者致力于利用积累的资本扩大生产规模产生价值，后者则是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要素投入产出比例，从而同时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在现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之时，必须通过上面所说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来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此处不再仅仅强调一般的产业规模扩大，而是强调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推动经济转型。这种以创新为生产要素的财富创造才能真正解决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资源稀缺、分配不公的问题，如人口资源（劳动力资源）分布不均、自然资源（水、土地、矿产、能源等）具有区域供给上的约束等，因为创新可以超越区域的限制，使得人口少、资源贫瘠的地方也能拥有自身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扩大再生产必须依托于信息技术或者其他高新技术，其关键在于以互联网作为媒介、以创新作为驱动力。2016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将研发支出（R&D）计入GDP，以反映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并且修订了1952年至2015年的GDP数据。从这些数据看，创新尤其是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在不断提升的。^②

若撇开媒介单纯地谈创新是没有意义的，依托于互联网的创新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也推动了新的财富创造模式的形成，其主要表现是技术与结构方面的变革。具体而言，商业模式技术变革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大数据、互联移动等方面，而商业模式结构变革则是打破了

^① 转引自张文贤：《科技创新：现代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源泉——刘诗白经济思想研究之一》，《经济学家》2011年第5期。

^② 《新GDP核算方法更好地反映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6-07/15/content_5091552.htm，2016年12月1日。

原有的集中式、垄断式现象，通过互联网的匹配便利跨省份、跨区域甚至跨境的交易的实现。依托于互联网孕育而生的创新商业模式不再是仅仅关注产品本身，而是向商业平台或者商业社区转移。在创新互联网商业模式之前，厂商或者零售商必须通过线下门店的扩张来接触到预期的目标客户，而现今由于科技创新的进步，消费突破了时间与空间限制。例如，借助“互联网+”模式下的电商平台，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进行商品采购并能够送货上门，且由于VR技术的引入，人们坐在家中也可以感受到3D真实场景中的商铺和商品，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完美结合。由此可见，创新促使商业逻辑发生了变革，商业推广不再依靠空洞的广告灌输、自夸式的营销洗脑。所以，在新的财富时代，财富创造必须将创新融入企业的经营行为之中，从研发、设计环节，到生产、包装、物流运输环节，最后进入陈列和销售环节，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创新的思想，然后再将商品或者品牌信息通过新兴技术媒体更好地传递给现有或潜在消费者，从而形成创新性的商业模式。财富的创造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变革来实现，在新媒体格局下也唯有创新才能产生价值。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创新是财富之父”比“劳动是财富之父”更能够直指财富创造的本质。

四、新财富时代中国经济的战略重点与供给侧改革

（一）新财富时代中国经济的战略重点

新财富时代中国经济的战略重点是市场、互联网和创新。

鉴于互联网和创新对财富创造的重要性，我国已经把二者提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习近平指出，“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①“创新”也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的第一条。^②2015年12月16日，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

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③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④而推动供给侧改革，互联网作用巨大。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⑤李克强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会议公报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⑦

互联网及其承载的海量数据是极其肥沃的

- ① 习近平：《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理论参考》2014年第7期。
- ②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1030/c64094-27756155.html>，2016年12月5日。
- ③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6/c_1117480771.htm，2016年12月5日。
- ④ 《习近平治国理政“100句话”之：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14/c1001-28054268.html>，2016年12月5日。
- ⑤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6-04/26/c_135312437.htm，2016年12月5日。
- ⑥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17/c1024-26702211.html>，2016年12月5日。
- ⑦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1030/c64094-27756155.html>，2016年12月5日。

承载海量财富的“新土地”，是知识生产方式下名副其实的财富之母，以“互联网+”和“创新”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是在对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以“互联网+”和“创新”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是现在的时代特征决定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要坚持和强调。

为什么把“市场”作为新财富时代我国的经济战略重点之一？这要从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来理解。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主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下，市场的作用被削弱和扭曲，企业生产与社会需求无法有效对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向前深化，市场要成为“互联网和创新”与实体经济联结的纽带、成为“互联网和创新”转化为财富增长的保障和“催化剂”。缺乏有效的市场制度建设，“互联网和创新”只是空中楼阁；建设有效的市场制度，“互联网和创新”才能真正成为财富创造的源泉。

（二）新财富时代供给侧改革的方向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在新财富时代，市场、互联网和创新应当成为新经济的三大战略重点：互联网是经济的“沃土”、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市场则是财富创造的保障和“催化剂”。新财富时代供给侧改革必须围绕这三大战略支点构建新体系、拓展新领域、出台新政策，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1. 宏观层面的供给侧改革方向

第一，增加制度供给，提高制度供给质量。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都表明，财富创造离不开良好的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安排能够使各生产要素有机结合，最大限度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在供给侧改革中，制度供给是

最重要的，而在各类制度供给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制度供给，特别是面向未来的线上、线下市场融合的市场制度供给。不解决市场制度供给问题，企业的生产就无法做到与市场需求变化保持一致，供给侧改革就无法真正完成。避免供给侧改革陷入这种困境的最有力措施就是强化市场制度供给：强调市场主导地位、强调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为提高市场效率进行制度建设。只有以市场制度供给为基础，充分发挥市场在财富创造中的保障和“催化剂”的作用，供给侧改革才更有望顺利完成并取得最终成果。

在今天互联网和创新成为财富创造重要来源的现实经济中，市场制度供给的重点应该转向互联网与创新的市场制度建设。一个有利于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市场制度、一个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市场制度，将对财富创造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的交易不同于传统的交易，传统交易的制度安排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互联网行为。互联网方面的市场制度供给应明确互联网资产（行为）的一般后果，包括排他性、共享性等，增强可预期性，界定明确的产权概念，有效促进和规范互联网上的竞争；创新方面的市场制度供给应特别强调开放性，同时鼓励市场主体的创新行为并对其创新成果给予足够的保护。

第二，加强基础设施供给，重中之重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正如过去土地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一样：土地及其上的资源、不同土地间的道路连接是过去财富创造的基础环境，因此我们强调“要想富先修路”；今天，互联网成为财富创造的基础和平台，因此，具有足够承载能力和接入能力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财富创造的重中之重。李克强 2015 年 3 月 5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三网’融合，加快建设光纤网络，大幅提升宽带网络速率，发展物流快递，把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

消费搞得红红火火。”^① 只有良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产生丰富的数据和保证方便的接入,从而带来活跃的用户和促发新财富的产生。根据“梅特卡夫定律”,^②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健全会为互联网吸引更多的用户,互联网使用人数的增多又促进了网络整体价值的提升,从而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为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提供坚实的基础。

第三,增加新财富时代经济的动力供给,主要是创新驱动动力供给。如果说互联网是供给侧改革的基础,那么创新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所在。习近平指出,“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创新。总结历史经验,我们会发现,体制机制变革释放出的活力和创造力,科技进步造就的新产业和新产品,是历次重大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复苏的根本。”^③ 这段话强调了创新的关键点:其一是从体制机制入手,其二是从科技进步入手。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是拉动传统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新常态面临的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产能过剩和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因此消费者会通过进口商品满足自身需要、企业会通过进口设备满足生产需要等等。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最主要动力就是创新。改善创新供给,增加创新驱动能力,必须从教育体制改革、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加高水平拔尖人才数量,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从根本上为供给侧改革提供长远动力。

为了实现上述三方面的供给,我们要培养市场经济思维、互联网思维和创新驱动思维,从宏观上把握供给侧改革的方向。

2. 中观层面的供给侧改革方向

从中观层面来讲,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包括产业结构目标、区域结构目标、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目标、要素投入结构目标、收入分配结构目标等等。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从市场、互联网和创新三大战略支点入手。

以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例,发达国家已经逐步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比重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服务业正日益成为其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我国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也是要增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尤其是增加第三产业比重。要提高产业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第二产业的发展就不能依靠盲目扩大产能、重复投资来实现,而是应当以“互联网+”、工业4.0、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等为抓手,搞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互联网和创新在发展第二产业中的重要作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技术进步,也只有如此才能符合《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也要依靠互联网和创新思维,努力发展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制度供给则为新财富时代第三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如最近几年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极大地满足了居民个性化金融服务的需要,增强了金融的覆盖面和服务能力,也极大地增强了金融体系的活力。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正是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财富创造基础平台、充分运用创新的思维和方法、充分挖掘互联网上海量的数据资源,使分散的客户资源得到充分融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金融业态并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并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制度供给方面的落后或缺失,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金融风险问题,因此前瞻性的制度供给在新财富时代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老年服务产业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我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规模大、速度快、

①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17/c1024-26702211.html>, 2016年12月5日。

② “梅特卡夫定律”的内容是:网络的价值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参见肖利华等:《ASP模式参与主体研究——及对网络经济规律的解释与修正》,《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8年第24期。

③ 习近平:《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6日。

“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可能是未来我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① 养老院式的集中养老模式成本高、服务水平低，显然难以满足未来全社会的养老需求。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可以创设更多富有特色的养老模式，比如小型家庭养老院模式、日托养老模式、货币化养老模式、信息化养老模式、异地互动养老模式等等。老年服务产业的发展，必须依托互联网和创新，以满足更多老年人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6年10月9日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② 供给侧改革需要互联网的“土壤”培育出新的需求增长点，改善失衡的供需关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助力供给侧改革：其一，平台耦合。加速各行业和互联网平台的耦合速度，凭借互联网高效传递信息的特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依托互联网快速收集信息的优势，扩大数据资产的规模。其二，用户匹配。互联网整合用户需求，精准助力供给侧改革，挖掘业务新增长点，改善供需不平衡现状，借助平台强大的整合与分析能力，构建大数据用户信息库，实现用户需求和互联网平台相匹配。其三，空间拓展。过去很多传统行业由于信息不对称而获得的利润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会逐渐消失，所以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刻不容缓。例如互联网金融行业，由于传统金融行业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比大企业窄，这大大阻碍了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发展和扩大经营，不仅影响了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还阻碍了整条产业链的升级和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通过增加市场制度供给、运用创新思维，利用互联网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对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意义重大。

3. 微观层面的供给侧改革方向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即“三去一降一补”。^③ 所谓的“产能过剩”，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首先，针对收入水平提高后的国内消费需求而言，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去产能”。但“去产能”不是简单做减法，同时也要做加法，也就是在去低利润、高污染产能的同时，建设高利润、绿色的生产线；在减少低质量产品供给的同时，增加创新性高质量产品的供给。对微观企业来讲，要做好加法，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创新是根本的动力。其次，针对全球市场而言，产能过剩的问题基本上不存在，因此“去产能”可以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借助互联网平台大力创新跨境电商业务模式；在政策层面上，国家自贸区建设提供了经典的制度供给样本。但从长远来看，面向国际市场同样需要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以保证出口竞争优势。同样，“降成本”、“补短板”也要依靠制度供给、互联网和创新：通过制度供给降低税费成本、行政成本等；通过互联网和创新降低物流成本，补齐民生短板、经济发展动力短板、社会事业短板等。

“去库存”主要是指降低楼市库存，这不能简单依靠地方政府政策刺激，而应该借助互联网和创新，通过市场化之路来解决。房地产交易中介是完成房产交易的主要力量，在传统的房地产交易中介行业中，客户进行交易所需要的临时性资金一般要由客户自行筹集，这加大

① 缪青：《以社区照顾实现“老有所养”》，《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0日。

② 习近平：《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 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09/c_11119682204.htm，2016年12月5日。

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五大任务》，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12/22/c_128554414.htm，2016年12月5日。

了交易完成的难度，从而临时性资金成为房产交易（特别是二手房交易）的一大障碍。借助互联网，房地产交易中介公司可以运用“互联网+房产+金融”的综合O2O服务平台这一创新模式，通过互联网平台P2P借贷方式获得完成交易所需要的临时性资金，这比从传统渠道融资更为方便快捷；同时，该部分P2P借贷资金有交易标的房产作担保，安全性有保障。由于解决了临时性资金难题，二手房交易更容易完成，也能促进新房交易进行，从而达到“去库存”的目的。为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制度供给应该提供风险保障，对平台实行资金监管，加强风险监控。

另外，在上述“互联网+房产+金融”模式中，房地产交易中介公司也实现了自身的“去杠杆”，因为其不必像在传统的交易方式中那样通过向银行贷款垫付完成交易所需要的临时性资金。

微观经济实践离不开互联网思维和创新思维，在当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时期，只有借助互联网基础平台，通过科学技术、体制机制的全面创新，才能达到淘汰落后产能、增加有效供给的目标。

五、结论

财富创造来源已经发生变化，从战略层面

上来讲，互联网和创新已经成为最主要的财富源泉。对于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从顶层设计上应该围绕互联网和创新进行系统、科学的规划，增加与互联网和创新相关的市场制度供给，努力推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鼓励创新创业，激发创新活力。具体而言，一是要开展大规模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过去说“想致富，先修路”，当下是“想发展致富，先修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比轨道高速更重要。二是要鼓励科技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创新，这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唯有创新才能将互联网上的海量数据转化为海量财富，破茧成蝶，变传统为现代，转夕阳为朝阳，化腐朽为神奇。三是要推进网络应用的安全与法制建设，为新经济的发展完善市场制度供给。要提升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产品、专利、标准都要抓，但战略重心是规则和标准。而唯有勇攀产品、产业和技术等创新高峰，方能拥有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

本文作者：经济学博士，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金融科技创新重点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任朝旺

Wealth Creation and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Huang Zhigang

Abstract: “Internet is the mother of wealth, and innovation is the father of wealth”, that is what we can find from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history of wealth creation theory. It is the most concentrated essence of wealth creation toda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hould make a long-term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new wealth era. Facing the realistic challen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normal, “market, Internet and innovation” are three strategic priorities, and they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designing the specific program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Keywords: wealth creation; Internet; innovatio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